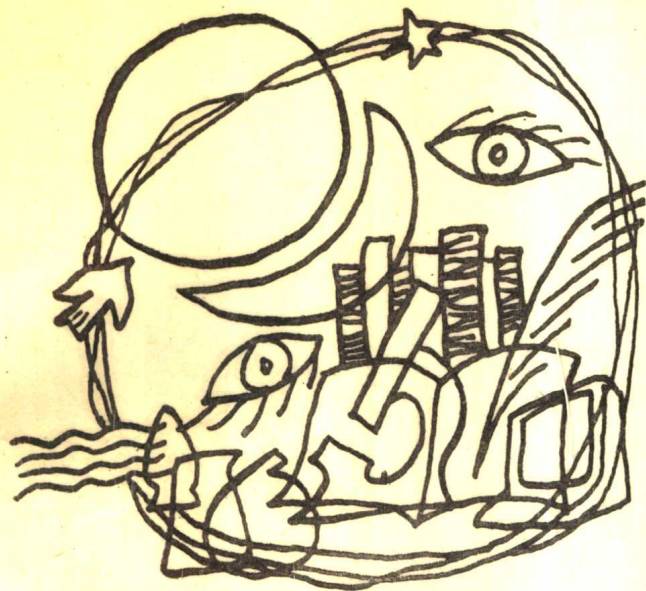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中青年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会

现代学术史

● 王铁 著

B234

W361

● 王 铁 著

汉代学术史

(沪)新登字第201号

汉 代 学 术 史

王 铁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50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本

ISBN7-5617-1360-6/K·113

定 价: 11.50 元



王铁,江苏常熟人,生于1948年11月。高中毕业正当“文革”,当过农民,当过工人。1977年底考入苏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考入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于1985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所工作。现为该所历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发表过论文《〈曾子〉著作时代考》《试论〈论语〉的结集与版本变迁诸问题》等多篇,参加过《文献通考》等古籍的整理工作。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天文与历法	21
第一节 概述	21
第二节 二十八宿和观象定时	24
第三节 五星行度与干支纪年	28
第四节 五官	31
第五节 颛顼历和太初历	33
第六节 刘歆的《三统历》	35
第七节 东汉四分历	40
第八节 汉代的宇宙结构学说	42
第九节 汉代的宇宙发生学说	47
第二章 数术	51
第一节 概述	51
第二节 五行	54
第三节 星占	57
第四节 风角	61
第五节 律学	64
第六节 《易》筮	67
第七节 卦气	71
第八节 六壬	75
第九节 太一与九宫	81
第十节 形法	86
第十一节 建除	89
第三章 医学	92

第一节	概述	92
第二节	帛书医经	95
第三节	《黄帝内经》的写作时代	98
第四节	《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象、经络学说	100
第五节	《黄帝内经》的病理学说和诊法、治法	105
第六节	《黄帝内经》的运气学说	107
第七节	《神农本草》	112
第八节	《伤寒杂病论》	114
第四章	养生与神仙方术	118
第一节	概述(上)	118
第二节	概述(下)	123
第三节	导引	132
第四节	吐纳、行气	134
第五节	房中术	136
第六节	服食	138
第七节	《周易参同契》	143
第八节	《太平经》	148
第五章	经学	154
第一节	汉代经学的兴衰	154
第二节	经学的说解和传授	161
第三节	今文学和古文学	165
第四节	《易》学	174
第五节	《书》学	183
第六节	《诗》学	190
第七节	礼学	194
第八节	《春秋》学	202
第九节	《论语》《孝经》学	210

第六章 谶纬	214
第一节 谶纬辨名.....	214
第二节 概述(上).....	217
第三节 概述(下).....	221
第四节 谶纬的影响.....	226
第五节 《易纬》.....	229
第七章 诸子学	237
第一节 概述.....	237
第二节 贾谊.....	248
第三节 《淮南子》.....	253
第四节 董仲舒.....	259
第五节 王充.....	264
第六节 东汉后期诸子.....	271
第八章 史学	281
第一节 概述.....	281
第二节 司马迁和《史记》.....	289
第三节 《汉书》.....	300
第四节 《东观汉记》.....	306

绪 论、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之一。

汉代疆域辽阔,国力鼎盛,学术和文艺也曾经高度繁荣,瑰丽多彩,对以后两千年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其他时代所不能比拟的深刻影响。

两汉四百年,学术的发展,如果作一粗线条的勾划,大致可以西汉昭、宣之际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百家争鸣、交流融汇的时期。

刘邦初建汉朝,承秦灭学之后,学术凋敝,“敢有挟书者族”的秦律影响依然存在。刘邦本人轻视学术,虽然有“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史记·太史公自序》),但都只是应付实际事务的需要。惠帝四年,废挟书之律,学术从此渐渐复苏。文帝即位,更加留意于学术,寻求治《尚书》者,得伏生;征申公为《诗》博士,又信用贾谊、晁错、阴阳家公孙臣等。并曾一度酝酿改制度、易服色。当时朝廷有博士七十多人,其中包括诸子传记博士,也有专治一经的儒学博士。秦焚之余的古籍这时也有较多的出现。自吕后至文、景时代,受官方提倡的是融合了道、法两家的黄老之学。这一学说,既注重君臣上下的名分关系,讲究统治术,又以因顺民性和客观事物的规律为基本原则,主张清净无为。汉初社会在长期战争之后,急切需要休养生息,稳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经济,这样的学说正适合时代的需要。正因为西汉前期实行

清静无为的政策，在文化学术方面政府一般不加干预，因而在文、景和武帝时代，出现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当时的诸侯楚元王刘交、淮南王刘安、河间献王刘德等也都倾心于学问，他们身边都聚集了一群学者，在朝廷以外形成了几个学术中心。如刘德，史称“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汉书·本传》）刘安则“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赋颂、黄白之术无所不究。（《汉书·淮南王传》）

武帝即位，汉兴已有六、七十年，国库和民间都财力充裕，清静无为的政策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武帝本人好大喜功，既要模仿唐虞之治，希望能厕身于尧舜之列，又像秦始皇一样渴慕神仙不死之术。作为先秦显学的儒家，经过文帝以来几十年的传播，现在也已恢复了力量。于是在臣下的怂恿下，武帝开始提倡儒学。继位第一年，建元元年十月（公元前141年夏历十月，当时以十月为岁首），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武帝批准了这一奏章。随后又讨论立明堂、除关禁、改革丧服、令列侯就国等制度。武帝及其臣下的崇儒行为不久就受到了当时尚在的窦太后（文帝的皇后）的反击，一年之后，提倡儒学的丞相窦婴、太尉田蚡都被罢免，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都下狱自杀。儒道之争演成为尖锐的政治斗争。但儒学的上升已成必然之势。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诸子传记博士的罢去大约也在这时候。第二年窦太后崩，田蚡复相，黄老之学在政治上的崇高地位最终跌落，经学的发展从此便成为不可阻抑的滚滚洪流。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丞相公孙弘奏请立太学，为博士置弟子员（太学生）五十人，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这一建议受到武帝的采纳并付诸实施。公孙弘这一建议对于学术史乃至整个社会历史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一是有了利禄的强烈

吸引力，天下知识分子从此都汇拢到读经这一项事业上来，到东汉，则即使为郡县吏，也必须先通一经章句，于是经学便成了知识分子普遍的学业，形成了“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的局面。二是儒者通往政治权力的道路从此畅通，其结果，就是造成了后来儒者能与外戚共同垄断朝政的局面。

武帝的尊儒，不过是为了给他的统治作文饰，并无意于以儒学来指导实际的政治。当时的对外战争以及由此引起的财政上的需要，使他重用的是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及其他各种人才。昭帝一朝和宣帝初年执政的是霍光，班固称他“不学亡术”，主要就是说他并不懂得儒学。因此学术在这一期间仍能有较自由的发展。

汉代学术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正好与西汉国力的上升时期相应。这一时期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总的来说都显现出一派蓬勃的生机，学术领域也是如此。《史记》和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的大赋中表现出来的浪漫主义精神，是这一时代的时代精神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这一时期学术发展最可注意的特点，是儒、道两家对于其它各家的同化吸收。道家的这一发展过程，以《淮南子》的成书为其顶点。将《淮南子》与马王堆出土的先秦黄老著作相比较，前者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它不但改造吸收了儒家关于仁义、礼乐的学说，并且努力把阴阳家学说和术数家的许多门类也都包容进自己的体系中来。至于名家、法家，则本来就与道家相通。儒家的吸收、包容工作，则可以董仲舒的《公羊》学为代表。《春秋》本来在儒经中以强调名分为其特色，董仲舒的《公羊》学更大量吸收了先秦的名、法家思想，使《春秋》的名分思想更丰富，并且具有了法家严峻的特点。董仲舒又吸收了阴阳家和术数家的学说，附会《春秋》所记的自然现象大讲阴阳灾异，使《春秋》与《易》《尚书·洪范》相并，成为汉代人推论阴阳灾异的主要经典之一。

昭帝始元年间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对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尖锐批判，是这第一个时期的尾声。宣帝朝起，汉代学术的发展便转入第二个时期，即儒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儒家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力量，到汉宣帝时代遂正式取得了学术上的统治地位。昭帝时的三公，如车千秋、王祈、杨敞等，都并非儒者，至少《汉书》并不讲他们与经学有什么关系。宣帝时的三公，如韦贤、魏相，则是有名的经师；丙吉、于定国虽原来学法律，但进朝廷后都虚心学习经学，实在因为在当时环境下，如果不懂经学，已难于在朝廷立足；至于曾为丞相五年的黄霸，则曾从夏侯胜学《尚书》，在为地方官时就提倡耨者让畔、男女异路，是典型的诈伪人物。许多经学史上的重要人物都显贵或活跃于宣帝朝。如三家《易》的创始人施雠、孟喜、梁丘贺，《大、小夏侯尚书》的创始人夏侯胜、夏侯建，《鲁诗》大师张长安、唐长宾、薛广德，《齐诗》大师和《后氏礼》的创始人后仓，《齐诗》传人萧望之，《韩诗》大师王吉，礼学大师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公羊》严、颜学的创始人严彭祖、颜安乐，《谷梁》学大师蔡千秋、尹更始等。

宣帝对经学比前朝更提倡，末年增太学博士弟子员至二百人，《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博士都增立于宣帝朝，因此而奠定了汉代今文经学流派的基本格局。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由宣帝亲自定其是非。这次经学大会被儒者目为盛事。

宣帝出身民间，熟悉社会情况，虽竭力提倡经学，但也喜爱刑名法术之学。他亲用的大臣张安世，则是著名法家人物张汤之子。宣帝去世后继位的元帝，就完全倾向于儒学。自此至于汉末，儒学的独尊地位就一直没有动摇；长远一点来说，儒学对中国思想界的二千年统治，就是从宣、元时代开始的。

哀帝时，刘歆要求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

都立于学官，拉开了今、古文斗争的帷幕，以后学术界的主要斗争，就是经学内部今、古文两派的斗争。元、成之世，讖纬之书大量涌现。纬书是《河》《洛》讖书、数术学与今文经学的合流，把它看作是今文经学的一个旁支也无不可。由于东汉光武帝是借助讖书对社会的迷惑作用起家的，所以讖纬在东汉一直受到统治者的尊崇，经学上有争议的问题也要折衷于讖纬。东汉后期，随着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矛盾的激化，道家和法家思想在知识分子中又逐渐流行起来。法家思想的兴起，在建安和三国前期达到高潮，而儒道的合流，则产生了魏晋玄学。

以上就是两汉学术发展的大略过程。

后一时期有一件在学术上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必须提及，这就是成帝至哀帝时代刘向、刘歆等人对古籍的整理。成帝河平三年，下诏广求遗书于天下，并诏刘向与任宏、尹咸、李柱国等人分任校书之职，刘向总领其事。刘向去世，哀帝使刘歆继承他父亲的事业。全部工作完成之后，刘歆便总括群书而奏进其目录《七略》，共著录古籍一万三千二百多卷。对于这次校书的意义，章太炎指出：

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乃无定集。然自秦皇以后，书复不布。汉兴，虽除挟书之禁，建元以还，百家尽融，民间唯有五经、《论语》，犹非师授不能得。自余竟无传者。东平王求《史记》于汉廷，桓谭假《庄子》于班嗣，明其得书之难也。向、歆理校讎之事，书既杀青，复可移写，而书贾亦赁鬻焉。故后汉之初，王充游洛阳书肆，已见有卖书者；其后邠卿章句之儒，而见《周官》；康成草莱之氓，而窥《史记》，则书之传者广矣。（《检论·订孔上》）

在此之前，同一种书籍，官府各部门所藏与民间所传，内容往往有多少，又有错简、讹字，把它们整理成定本，“使可缮写”，使可流传，学术得以普及，中华民族的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就是这一次古籍

整理工作的功绩。

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相对安定,当然是汉代学术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与后来的其他时代相比,汉代学术发展还有两个最重要的条件。一是先秦学术成果的积累。自春秋末期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经过战国的两、三个世纪,自然科学、社会学说、哲学、数学等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战国时代天下处于分裂局面,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交流和总结,汉代的统一则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汉代学者对先秦学术当然有发展,但他们的成果中有很大部分,是对先秦学术的传述、整理和总结。如《史记·天官书》的大部分内容,是转录战国时代甘德、石申、巫咸的天文学著作;《黄帝内经》一百六十二篇,其中有一部分可以推测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汉代儒、道两大家的学说,粗略地说,不过是在新形势下对先秦诸子学说的综合;汉代的经学,是对先秦儒家经典的解释。当然,传述、整理、综合、解释也都是成就,也包含有创造性的成分。我们从《汉书·艺文志》中可以看到,诸子、数术、方技、兵书各略中,西汉末年还存在的先秦古籍,其数量远远超过西汉人的著作。这些古籍中的大多数我们都已经不能见到,但它们的一部分内容则被包容在汉代学者的著作中。汉人著作整体表现出来的学术水平当然是一个高峰,更由于我们在许多方面已无法详细了解这一高峰所由以耸立的根基,它在我们面前似乎是突然拔地而起,因而也就愈益显现出它的峻高。

汉代学术发展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西汉统治者对学术研究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武帝以前百家竞起的局面固然不用说,武帝罢黜百家,但他也只是取消了他们在官学中的位置,并没有依照董仲舒的要求,将它们作为“邪辟”之说看待而用行政手段使它们“灭息”。所以武帝以后,百家之学在民间还是有传习的自由。因此形成了汉代的一个特殊现象,即私学与官学的并存和私学对官

学的补充。私学是从孔子以后到西汉，除了秦代禁学的一个短时期外，一直存在着的，武帝以后的私学只是这种情形的继续。西汉后期私学的存在，如成帝时有严君平，“闭肆下帘而授《老子》”（《汉书·王吉传序》），耿况与王伋共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后汉书·耿弇传》）等，这是公开授徒的例子。至于家族内部父子相传，更不是政府所能干预。武帝太初元年招募民间治历者二十多人，其中包括唐都、洛下闳。昭帝元凤中讨论历法，也有民间术士参加，其中单安国、栢育、宝三人都治邹衍《终始》之学。成帝时令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平帝时“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以及以经学教授者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汉书·平帝纪》），都表明了朝廷对存在私学这一事实的承认。至于讲授经学的私学就更普遍，不仅有讲授朝廷承认的今文经学、又有传授不为朝廷所承认的古文经学及《毛诗》《谷梁》等。古文经学就是赖私学的传播得以一直流传到东汉。东汉一代，经学、诸子、数学等的私学也仍然存在，本书有关章节还要谈到。汉代的私学，对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项学术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

东汉统治者对待学术的态度没有西汉开放。东汉初期竟至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荒谬的谶纬，桓谭、郑兴等人因非议图谶几乎惹致杀身，这与西汉推行经学的情况大不相同。又班固因为私编史书，竟至于下狱，后来因为书中内容没有触犯忌讳，才得以获释，这又与西汉司马迁能在没有干涉的情况下撰写《史记》，成书以后又得以在士大夫中间流传的情况不同。《史记》对刘邦、武帝多有不敬之词，东汉明帝评论司马迁，说他“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讥刺，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班固《典引·叙》），说明象《史记》这样的信史，在东汉是不允许产生的。所以在王纲趋于解纽前的东汉前期，学术空气比较沉闷，从《隋书·经籍志》看，这一时期除辞赋以外的

私家著作极少。汉代的学术成就，大部分产生于西汉。这也说明了学术的自由发展，是学术繁荣的必要条件。

二

汉代占统治地位的宇宙观，是天人一体的阴阳五行思想。阴阳五行思想在战国末年和秦代就已经十分盛行。秦始皇曾推五德之运来建立秦代的各种制度。汉皇朝代秦而起，这一影响也并不间断地延续了下来。现在能见到的汉初文献极少，但是《汉书·魏相传》引有刘邦时相国萧何等大臣所上的奏议，说是天子的服饰应该随季节更换，“法天地，顺四时”，这一奏议得到批准并见诸实施。《张苍传》说刘邦时张苍推五德，以为汉得水德，所以制度多循秦之旧。这些都足以显示阴阳五行思想在汉初就已占有的地位。

汉代思想方法的特点是重经验，发展到汉代的阴阳五行思想，是按生成论的思路被理解的。尽管关于宇宙之前最早的存在，各派思想家有道、太极、太一等等不同的概念，但学者们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在天地产生之前有一种精微的物质构成的元气存在。元气蕴涵阴阳二气，阴阳相分，阳气凝而为天、为日，阴气凝而为地、为月。阴阳二气又交媾而产生人与万物。阴阳二气的彼此消长，产生了昼夜和四时的循环，这样就形成了宇宙。阴阳二气是构成宇宙中万物的基本物质，二气的自身运动及其相互作用，是自然界一切运动变化的根本动力。

阴阳五行思想认为，既然宇宙是由阴阳二气所生成，它也应该在各个层次上都像天地一样具有阴阳对待的相对关系。这是基于类比的思维方法，但也包含有宇宙和谐、统一的思想因素。于是一切事物，或一切事物的内部，都可以根据它们的组成成分或特性、功能、相对位置作阴阳的划分，如水与火、寒与热、表与里、雌与雄、君与臣等。

阴阳二气的运动又产生木火土金水五行。五行概念出自《尚书·洪范》，原意是指构成自然界地上部分的五种基本物质，但是在阴阳五行思想的体系中它被高度抽象，用以对自然界中的许多事和物作五分法，并表示这五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方位有东南中西北五方，声音有角徵宫商羽五声，颜色有青赤黄白黑五色，人体内脏有肝心脾肺肾五脏，甚至伦理道德也有仁礼信义智五常，它们都与五行相对应。最重要的是五季春夏秋冬季夏（或四季月）与五行的对应。西汉人辑集的《小戴礼记·礼运》说：“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京房《易传·序》说：“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变动不居，周流六虚。”道家著作《淮南子·原道训》也说：“（道）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节四时而调五行。”可见汉代入思想中的五行概念，首先着眼于由自然界季节更换所体现出来的五种性质、特征的更替。

这一阴阳五行的宇宙图象有几个值得重视的特点：第一，宇宙中的一切，天、地、生物和非生物，都是由气所生成，表现了中国古代对于世界物质性和在物质性基础上的统一性的信念。第二；世界的统一性也包括人体和人类社会在内。人体的组成和他的生理活动，社会的结构和它的发展，也都服从阴阳五行的原则和规律。同时人类作为宇宙这一有机系统的一部分，与其它部分处于种种相互联系和作用之中。宇宙的最佳状态是阴阳的动态平衡，所谓“和”，人类的活动要遵从自然规律，以保持这一平衡，否则自然界将会由于平衡的打破而产生一系列异常的反应，结果将危及人类本身的生存。这是阴阳五行思想的社会理论的基本原理。这也是天人一体和天人感应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三，宇宙这一大系统和它所包含的各子系统，它们的发展都是由于自身内部阴阳的消长和五行的生胜，而并不需要任何外部力量的推动和外部意志的支配，这样的体系与人格的天或上帝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从上述特点来看,阴阳五行思想所具有的科学性是很显然的。它是中国古代为了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而提出来的一个科学的假说体系、科学的理论。它有别于纯粹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它的提出是以长期感性经验事实的积累为基础的,提出之后又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实践,如应用于医学、农业等。它使人们冲破了商代、西周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命、鬼神的迷信观念,以全新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具有巨大的进步作用。阴阳五行思想整体转化为神秘主义,是后来的事。一种科学理论一旦产生后,必须在经验事实的检验下不断修正和发展自己,并在一定时机被一种更新的科学理论所代替。阴阳五行思想的悲剧就在于它的逐渐僵化和绝对化。正如李约瑟博士所说:“中国的五行理论的唯一毛病是,它流传得太久了。在公元一世纪是十分先进的东西,到了十一世纪还勉强可说,而到了十八世纪就变得荒唐可厌了。”^①它在汉代正是处于崛起状态的富于生气的科学理论,尤其在汉代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对战国阴阳家学说中原有的神秘成分也有所淡化。阴阳五行思想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宇宙观,标志着汉代(主要是西汉)这一学术发展阶段上理性主义的增长。

最有启发性的例子,是汉代对于旧数术的改造。龟卜和《易》筮,在商周时代都被看作是向神请示的方式。但在汉代,《易》筮的过程被理解成是以蓍草作为象征物,对宇宙生成过程的重现,因而《易》筮的结果,被看成是客观事物自然发展将会产生的结果。由孟喜、焦延寿、京房创立的卦气系统,则把六十四卦同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连系起来,根据气候所表现出来的阴阳消长情况进行占验。至于龟卜,汉代人 also 把它纳入阴阳五行的框架中。《汉书·王莽传》记占卜,已有“兆遇金水旺相”的说法。现在能看到的敦煌文献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译本,P 318。